

敢领改革风气之先 勇立开放时代潮头

高校是人才招引的重要阵地

□ 胡金焱

258.02万人,位居全国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8%,超出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这一培养规模和对高水平大学的迫切需求,与高水平大学数量少,供给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山东高等教育大而不强,一个不容回避的原因是,山东对高等教育长期投入不足,日积月累导致了整体竞争力不足。据统计,至少十年以上,山东普通高校毕业生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在全国位居倒数第3-5位。

为缩小与江苏、广东等地区的差距,山东近年来加快了科技、教育资源的整合步伐,除整合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学院成立新的齐鲁工业大学,整合泰山医学院与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山东省立医院成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外,还将省内燃机研究所并入山东交通学院,省化工研究院并入青岛科技大学,优化了我省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也更加突出了高等学校在山东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另外,进入“十三五”以来,省财政筹集50亿元专项经费,立项支持一流学科建设,这些重要举措,都显示了山东推动高等教育奋起直追的决心。但与发达省份相比还远远不够,如近期深圳再次发力,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元,集中资源办更多高水平大学。山东应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下决心拿出与山东经济地位相称的财力来支持大学发展,支持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为山东培养和留下更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山东高等教育打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未来。

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各种“帽子”人才,主流阵地就在高校。发挥高校对人才的虹吸效应,吸引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聚集,一方面要靠教育投入,另一方面要靠灵活的体制机制

高校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人才聚集地,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各种“帽子”人才,主流阵地就在高校,因此大学的高度往往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高度。发挥高校对人才的虹吸效应,洼地效应,吸引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聚集,除了教育投入外,还要搞活高等学校的人才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山

东要建设人力资源强省、科技强省,必须实行更加积极、灵活、开放的人才政策。

2003年以来,山东实施了“泰山学者”等系列人才工程,延揽了一批学术精英,带出了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了一批强势学科,造就了一批领军人才,但在此过程中,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也暴露出来。如长期以来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的用人编制控制过严,对高级职称人员比例管控过紧等。山东省对博士学位授权单位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控制在50%以下,其中正高级职称人员控制在14%以下,而浙江、广东等省份对于此类高校的高级职称比例一般控制在60%左右,正高级职称人员则将近20%。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比例控制更加宽松,高级职称比例往往达到70%左右。山东较低的高级职称人员控制比例,形成了事实上的“职称壁垒”,限制了高校引进千人计划专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高层次人才。从2017年开始,国内一些城市推出了“送户口”“送房补”“免费租借办公区”等措施吸引人才;2018年伊始,连大力控制人口规模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开始推出针对高端人才的引进办法。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出台《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岗位管理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高校岗位总量不再与人员控制总量硬性挂钩,而以“生员比”这一指标来确定,并提高了高级岗位设置比例,这一重要举措反映了山东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向用人单位和人才松绑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此外,我们在引才上还采取了更灵活的模式,鼓励和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来山东高校短期或长期工作,就地参与创新创业,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构建有利于各类人才自由流动的制度和环境,为山东的今天留住人才,为山东的明天储备人才。

可借鉴美国高科技产业带“128公路”、硅谷或国内广深经济带模式等发展经验,依托高校建立和发展一批大学科技园,同时整合全省创新资源,建立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科研平台和运行机制

高校是科学研究的主流阵地,近年来国家科技成果三大奖70%以上来自于大学,说明从基础研究出发产生的科研成果主要来自大学。从新旧动能转换的角度看,大学决定了科学研究的原产地、

创新体、基础源。当前,山东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需要依靠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与美、英、日等科技强国相比,中国缺乏在高科技领域的原创性成果。与苏浙粤等发达省份相比,山东也面临同样问题。我国很多高新技术要从国外引进,而山东80%以上的技术是从省外、境外引进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及时调整发展理念,抓住了“互联网+”等科技创新的风口,释放了科技创新的快速增长,搭上了经济浴火重生的头班车;而山东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较强,对科技创新的认识不深刻,顺应不及时,把握不坚决,错过了发展先机,导致产业结构不优,新动能成长不快,发展活力不足,经济效益不高的“心头之痛”始终难以根除。

因此,山东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任务非常繁重,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和完成的。但是,越是繁重就越要保持定力,要下定决心从源头创新解决。从长远看,无论是传统动能的转型升级还是新动能的形成,都取决于科技研发能力和水平,而决定科技研发高度的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显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也正是高校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2016年,山东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的科技奖励,囊括了省自然科学技术奖和技术发明奖的全部一等奖,获奖数量分别占总数的72.7%和75%,从侧面反映了高等学校的原始创新能力。因此,抓住了高等学校,就抓住了“创新”这一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牛鼻子”。

山东可以学习借鉴美国高科技产业带“128公路”、硅谷或国内广深经济带模式等发展经验,依托高校建立和发展一批大学科技园。同时,在具有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在有望占据先发优势的引领性战略制高点,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依托相关领域最有优势的高等学校,整合全省创新资源,建立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科研平台和运行机制,实现高等学校同其他各类科研机构、企业研发机构的协同创新格局。此外,要在政策设计上为“四新四化”产业的崛起创造条件,推动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为高校筑巢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创新创业舞台,共同构筑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与制度框架。

(作者系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山东省省级新型智库“区域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校是人才的第一培养地,聚集地、创新地,也是人才战略的核心。一般而言,产业人才和技术人才主要集中在企业,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从系统的观点看,大学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没有一批高水平大学的支撑,就不可能建成一流的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山东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都是我省深刻认识到高校在人才培养、聚集和创新上不可替代作用的充分体现。山东要实现新一轮崛起,建设科技强省、经济强省,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拥有一批高水平大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汇聚国内外高层次人才队伍,贡献各学科领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高水平大学越多,就越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吸引的优秀生源越多,将来留下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就越多,由此形成良性、可持续的人才源,形成高校人才培养的“马太效应”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镇,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引进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未来的人才竞争力,地区亦然。纵观当今世界,一流大学越多的国家,科技人才越多,国家竞争力越强,经济也越发达。从国内看,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省都把办好高水平大学作为实现区域跨越发展、增强综合竞争实力的战略举措。高水平大学越多,就越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吸引的优秀生源越多,将来留下的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就越多,由此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人才源,形成高校人才培养的“马太效应”。

目前,山东高校数量虽然位居全国前列,但大而面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山东现有普通高校145所,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苏的167所、广东的151所。但从“双一流”高校数量看,江苏共有15所,广东5所,山东只有3所。这一数量上的差距,反映的是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差距和人才培养能力的差距。此外,2016年山东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

以“社会复合体”激发创新潜力

□ 侯小伏

地体会到了市民的诉求和压力,以往的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意见和行动难统一等,逐渐被平等沟通、伙伴合作、步调一致所取代。社会复合体实质性地推动了政府减少管制,提高绩效和改善公共服务。

孕育了一批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广泛多层和制度化的协商,加强了政、学、业、媒和公众的互动,孕育了一批具有公共精神、关注创新创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整合要素资源,发现新的社会需求,创新各种技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市场风险,积极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在特定行业或领域起到了领导者、协调者和推动者的作用,成为政府推进创新创业、改善民生的有力助手。

营造了创新创业和文化传播兼容嵌入的氛围。一大批知识分子依托单位进入复合体,以“候鸟型”“两栖式”方式发挥人才价值,成为知识源和创新源,推进了杭州研发+设计+制造、网络+网商+快递、观光+休闲+会展、文化+创意+科技等复合产业链和新模式、新业态的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多部门联合攻关,多界别复合参与的社会复合模式,为杭州市面临的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巧妙的工具,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创新的巨大驱动力。社会复合体倡导以

生活的心态和方式创业,休闲与创业相互嵌入,生活与工作相互兼容,不仅培养了杭州人平和的心态、务实的作风、兼容的性格与包容的素质,也使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得以传承优化。

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运用社会主体复合创新的工作机制,杭州市实施了一系列综合保护工程,提升了城市环境品质,吸引了高科技人才前来。社区治理复合主体创新,党组织、居委会、公共服务站“三位一体”的自治组织建设,增强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回应性、责任性及效率;社区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和“事随佳”调节机制,协调了劳动关系争议和邻里纠纷,为创业创新打造了一个和谐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

借鉴杭州经验,山东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也应进一步重视通过社会组织创新来整合、重构社会资本,从而充分释放蕴藏在各类社会主体中的发展潜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应从以下几方面重点发力:

突出问题意识,寻找社会组织创新及项目开展的突破口,应根据特色、优势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可预期的产业,建立多种类型的产业类社会复合体运行平台。同时,把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难以覆盖、容易忽略但却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作为先行突破口。应重点关注行业联盟、公共



服务、知识服务、互动传播、品牌传播、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领域的复合创新。

以共识、协商、契约、联动的方式,建立创新型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创造、传递与分享共同的价值形成共识,为创新型社会组织的运行提供思想基础。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寻找结合点,并以协议的形式形成合作的硬约束,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方法;以契约形式把共识固定化,由共识所产生的凝聚力转化为契约所产生的行动力,是组织运行的机制保障;突破行业界别职业身份壁垒,在互动中相互支撑、优势互补,形成功能的复合联动,使社会组织创新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合理确定政府角色定位,建立创新型社会组织的规范制度框架。政府要承担起资源配置者、力量整合者、平台搭建者和制度保障者的角色。可采用购买服务项目、资金注入先期启动、财政注入激活,同时配套改革进行资源配置;搭建具有权威性的具有沟通、协调、反馈机制的平台;为创新型社会组织提供合法身份、制度环境和政策保障,建立人才保障和柔性人员管理机制,在运作机制、人才队伍、资金扶持、评价激励等方面建立规范的制度框架,为创新型社会组织运行奠定制度基础。(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党政、知识、行业、媒体和社会组织联合而成的关系平等、制度规范、网络共享的“社会复合体”,能够有效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这一独特的“杭州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前,山东正处于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关键时刻,如何建设综合型创新主体,形成创新的社会氛围,仍有待破题。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若要破解经济问题,“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不可或缺。

以国内经验看,杭州市之所以能够在新一轮以创新创业引领的地方竞争中脱颖而出,其背后的社会组织创新功不可没。通过社会组织创新,杭州市将党政、知识、行业、媒体和社会组织相联合,建立了关系平等、制度规范和网络共享的“社会复合体”,为其亲商亲民的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厚植了肥沃的土壤,提供了充足的动力。这种通过社会组织创新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杭州模式”,发挥了如下几项重要作用:

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复合体之间通过持续地交流对话、协商行动,逐渐形成了共同体内信息共享、价值追求、议事程序和管理规则的共识。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参与各种活动,直观而深切

金融开放要善用底线思维

□ 王朝阳

生产过剩性质的危机,现代经济危机大多与金融因素有关。从国外的教训来看,因为金融开放措施不当诱发经济危机的情形并不少见。

金融开放的底线,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2018-2020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中都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虽然整体可控且尚未形成系统性风险,但仍有必要高度关注并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妥善应对。我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体系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石。银行在面临不良贷款提升、过剩产能行业风险暴露,深入参与非传统信贷业务以及资产负债表多元化配置之后,信用风险持续累积,期限错配的管理难度提升,资产负债匹配更加困难,“资产荒”和“负债荒”同时出现,使得银行在流动性管理上面临巨大困难,进而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风险。

从更加宏观和开放的视角看,我国存在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相互强化的可能性,这也符合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从外部环境来看,除了全球复苏基础不牢、英国脱欧加息、大型经济体政策分化以及美国政府行为不稳健等风险外,溢出效应最显著的当属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从危机模式转向正常模式,加息和缩表并举,美元可能重新获得相对强势并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阿根廷货币危机正是在此背景

下爆发的。10年前的次贷危机,是美国在长时间低利率之后进入加息周期,从而刺破房地产次级贷款泡沫所引发的。在市场相对出清之后,美国股票市场已经连续上涨,但其经济增长及创新能力是否足以支撑处于高位的股市,现在看来存在较大的疑问。如果发生意外的“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将会触发国外风险资产下跌螺旋。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我国来说最关键的还是先做好内部的事情,以自身稳定与发展化解各种外部不利因素。

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金融开放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作为一种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行业的开放,二是作为资本与金融属性的开放。在金融开放过程中,要鼓励的是中长期的竞争,防范的是短期的流动,目标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着眼点是真实的经济活动。因此,对于第一形式的金融开放应该持积极的态度,对第二形式的开放则应持审慎的态度。

作出上述判断的背后,还有两方面道理。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东道国市场有很重要的动机是追随本国企业,或者其进入后有助于吸引更多本国非金融企业的进入,这些都具有经济活动的真实成分,对于东道国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和技术改造升级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符合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会产生显著的鲶鱼效应,能够强化本地市场竞争和提高服务效率。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有必要借助开放的外力。

回顾我国金融开放的历程,基本秉持了上述思路 and 原则。近期我国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在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对市场制度建设、金融监管体系、宏观经济稳定等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对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要求,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规则,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交易制度等,即通过制度规范形成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金融监管改革如何把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的理念落到实处,通过机构改革等合理的部门设置化解彼此间的监管空白、监管重叠等问题,在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下协调处理好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探索和尝试。

总之,宏观经济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根本所在,这就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以及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配合方面,能够形成根据新形势下调整的机制工作,才能有运用底线思维,做好这些方面的配合工作,才能为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开放包括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打好基础,把金融开放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运用底线思维推进金融开放,不能固步自封,而是应在明确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探讨何种方式的金融开放有助于深化改革,从而在工作中勇于推进实施。

2018年4月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加速推进,体现在市场准入、业务放宽、金融基础设施放开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掌握主动权。”我们把新时代的新精神与新理念落实到金融领域,意味着金融开放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

底线与底线思维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简单地说,底线是指不能突破的红线,一旦突破则可能发生质变,因此可以理解为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底线思维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指导行动的方针,即在明确底线是什么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去作为,在确保不发生质变的同时争取最大的红利。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底线不应该是静止、机械和一成不变的,依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底线的认识也应该动态调整。从当前国情出发,所谓质变的一种情形就是经济危机。区别于以往资本主义

芬兰如何实现

□ 睢党臣 曹献雨

精准化养老

不断提高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是应对老龄化压力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芬兰的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

近年来,为应对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在不断地建设和探索中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养老服务供给缺乏有效性和针对性、供求失衡严重、供给无法满足个性化细分化的养老服务需求等问题。因此,我国急需增强养老服务体系精准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芬兰作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入老龄社会时间较早且程度较深。为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冲击,芬兰养老服务体系以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中心点,不断优化养老资源的供给平衡,使养老服务供给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准确的地点提供有效的养老服务,形成了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总体上看,该体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优点:

通过“制定评估标准,信息化调查,建档立卡,动态调整”等措施精准化识别养老服务需求。芬兰在评估对象、评估内容、评估工具、评估时间、评估人员及方案设计方法等方面制定了相应标准。为充分了解老年人的身心状况、生活状况、家庭设施安全情况及社区服务状况等信息,芬兰研发或引进了一系列信息化评估工具。在这个基础上,芬兰为每位老年人建档立卡,以便了解老年人年龄、身心健康、病史、经济状况等基本情况。在制定养老方案时,各部门会根据情况及现实变化对养老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充分体现灵活性与动态化。

通过“瞄准养老服务对象,因人施策,确定供给主体,明确供给责任”等措施精准化供给养老服务。如,老年人需要临时性照料,日间照料中心、日间老年医院、托老所可以提供不同的养老服务;老年人需要身体或心理的专业照料,可以选择急诊护理或长期照料。芬兰将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分为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服务、临时性照料、康复保健服务、临终关怀等种类,并根据不同的需求制定相应的养老服务供给方案。芬兰相关法律法规对养老服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主体等进行了详细规定,从而明确不同主体的供给责任。

通过“部门联动,人才管理,全程监管,精准考核”等措施精准化管理养老服务。芬兰对养老领域涉及的部门与机构进行了功能划分,主要分为引导与指导、研究与发展、认证与监管、提供服务四个方面,并根据功能划分指定相应的负责部门。为保障养老劳动力供给,芬兰采取“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的市场需求量、延长现有劳动力工作年限”等措施。芬兰非常重视对养老服务的监管工作,不仅专设国家福利与健康监管局负责监管工作,还在每个地区设立监管机构,并为每位老年人安排一位责任人,定期考核责任人的职责履行情况。

通过“分层分类,托底救急,精神关注,技术监测”等措施精准化支持养老服务。芬兰将老年人需求进行分层分类,以此确定养老服务补贴额度,是否对老年人住宅及养老设施进行改造,是否兴建综合性老年公寓和老人服务及娱乐中心等。在托底救急方面,给予不能保障基本养老生活水平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收入越低的老年人得到的补贴越多。同时,芬兰老年人可以在数百个老人服务和娱乐中心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从而得到心理慰藉,提升生活质量。芬兰政府还为每一位老年人安装了电话座机报警器和报警腕表,监控中心会根据报警情况迅速提供相应服务。

针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薄弱环节,借鉴芬兰上述经验,我国今后应着力加强养老服务供需间的衔接,改变过去粗放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重点工作:积极开发、引入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工具,动态开展老年人基础数据摸底调查,研发居民养老评估工具,需从人文关怀、个性化照护的角度出发,本着科学性、实效性、灵活性原则,充分探索老年人需求,评估工具应涵盖居家照护、社区照护、长期照护、急性照护、康复照护等评估套件,以达到掌握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并提供精准化养老方案的目的。此外,我国也可引进国外成熟高效的评估工具,有效加快精准化建设进程。摸底调查应以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对象,每个社区都要对老年人基础数据进行收集与追踪,以动态调整老年人基础数据,并据此对老年人需求进行分层分类。

建立监管与考核相结合的精准化管理体系。在养老服务评估机制方面,应建立涵盖养老机构资质、服务对象权利保障和服务实施过程的评估标准,包括市场准入、管理能力、人才队伍、服务水平、卫生条件和建筑设施等指标。在养老服务监管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监管部门、企业和第三方的监管作用,构筑起严格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网络体系,精准考核制度的建设,一方面,可将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将考核与问责有效结合;另一方面,可以社区为单位明确养老服务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并考核其职责履行情况。

建立养老保障多部门联动机制。目前,我国涉及养老保障的多个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养老服务功能划分不够清晰,难以有效发挥职能部门的联动作用,造成各部门出台的政策难以形成合力,致使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仍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应借鉴芬兰经验,将养老保障涉及的部门与机构进行详细的功能划分,并注重彼此间的信息互联,建立包括土地、规划、民政、发改委等多个职能部门的联动机制,以提高养老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推动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应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由政府牵头建设一个全国性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其他各地区、社区的养老机构、服务商和民政部门接入该平台,通过协调统一不同养老服务供给方之间的资源和数据,实现养老服务信息的互联互通。智慧养老服务平台通过将采集到的数据汇总形成信息数据库,并与养老服务需求方、供给方、民政等部门互联,有效整合养老服务资源,提高养老服务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降低养老服务成本,为养老服务体系精准化建设做好技术支持。